

《论语》俄译的社会历史语境考察

信 娜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论语》翻译是儒学文化传播的桥梁, 受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 不同的译本呈现不同的面貌。本文从众多《论语》俄译本中选取典型译本进行历时研究, 描述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产生的译本的特点。研究发现, 《论语》俄译经历近三百年, 每一种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都会对《论语》俄译产生具体规约, 不同历史时期的《论语》俄译本具有不同的面貌。将社会历史语境纳入翻译研究可突破翻译内部研究的局限, 有助于认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关键词: 论语; 社会历史语境; 译者; 视域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论语》在俄罗斯的翻译始于1729年,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已有17个译本。有全译本, 有变译本, 有深度翻译本, 有叙事性翻译本。哲学诠释学认为, 人们在理解事物之初, 思想中已经存在着一个理解的前结构。(海德格尔 1987: 184) 每一译者在翻译《论语》时, 必然会根据文本所处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对文本作出符合其当时时代语境的诠释。历史与文化背景构成的社会历史语境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译本的特点。每一种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都会对《论语》俄译产生具体的规约, 使其符合当时社会大系统的总体属性和功能。所以, 《论语》俄译在不同的时候历史语境下必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我们拟从《论语》众多译本中选取波波夫(П.С. Попов, 1842—1913)、克里夫佐夫(В.А. Кривцов, 1921—1985)、谢缅年科(И.И. Семенов, 1947—1998)及佩列洛莫夫(Л.С. Переломов, 1928—)的《论语》俄译本, 历时描述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产生的译本的特点, 考察一百多年来《论语》俄译和其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深刻关联, 揭示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

2 早期俄译: 以波波夫译本为例

《论语》最初的俄译始于沙俄派驻北京的传教士, 殖民侵略、宗教传输及文化的初次接触构成了这一时期《论语》俄译的社会历史语境。在此语境下, 《论语》的俄译一方面是为了解中国文化, 但更重要的目的是借《论语》俄译宣扬基督文化, 一定程度的基督化则是这一时期《论语》俄译本的显著特点。

2.1 社会历史语境

17世纪, 俄国崛起, 开始了领土扩张以及殖民侵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俄国形成了“中国风”, 俄罗斯汉学应运而生。1700年, 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发出派遣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手谕, 经康熙帝同意, 1715年俄国正式派遣东正教教士团驻北京。自此, 除传教

和主持教务外，驻北京的部分俄国传教士开始译介中国典籍，以使自己及后来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同时也收集情报，配合沙俄对中国的扩张。西方对东方进行的殖民活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东西方文明密切接触的作用。但是，殖民过程必然伴随不平等的文化交流，传教士译者的翻译活动也必然带有明显的殖民性，因为身为殖民者的译者，很难合理看待原语文化，更不会尊重。他们侧重以教义来阐释和翻译原文，翻译方法上主要是归化的翻译方法，翻译的目的也在于为殖民服务，而不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波波夫的《论语》俄译正是在这一社会历史语境下产生的。

2.2 译者视域及译本特点

波波夫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其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浓厚的宗教氛围深刻地影响着他的的人生观。他十二岁进入一所神职学校，为将来做一名好牧师埋头钻研神学。在波波夫神学修养越来越深的时候，他却开始痴迷于中国的古老文化，进入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师从瓦西里耶夫（В.П. Васильев，1818—1900）教授。毕业后，波波夫被沙皇政府委任到外交部亚洲司工作，接着就被派遣到驻北京传教团做翻译官，在中国工作了将近三十年。驻北京工作期间，他主编出版了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汉俄字典》，出版了著作《中国国家机构》、《中国的宪法与地方自治》，翻译了汉语经典《孟子》、《论语》。如果说，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翻译为西方人打开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大门，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波波夫教授为俄罗斯人打开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大门。

由波波夫的生活环境、求学经历、宗教信仰、传教经历、翻译中国典籍的活动，可以归纳出他作为一名传教士译者，其视域最大的特点在于，宗教是其看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波波夫翻译《论语》的目的不是宣扬中国儒家文化，而是希望在儒家文化中寻找与其基督教文化的相似点，借机宣传基督教文化。波波夫的基督徒身份和深刻的基督信仰构成了其基本视域和理解原作的前见。儒家文化的基督化是波波夫《论语》译本的最大特点。比如，在译本中，波波夫经常使用基督教宗教含义的词汇翻译解读核心概念。他最早建议将“心”译为术语 *сердце* 和 *душа*，这就赋予了“心”以西方基督教色彩，以至于西方学者每次不得不解释俄语 *душа* 和汉语“心”的区别。“天”的概念是整部《论语》的核心思想，共出现26处（不计重复），除8处是以“天下”、“天子”等词汇形式出现，表示“世界”和“君主”外，其余则是以中华文化独有之“天”与“天命”的概念出现。波波夫使用俄罗斯人最易理解的语言和文化意向 *Небо* 翻译“天”。根据《俄语详解大词典》（«Большо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的解释，*Небо* 是“上帝、天使、圣徒居住的空间或天堂所在”（по религиозным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м: мест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где обитают Бог, ангелы, святые и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рай）。可见，*Небо* 同样赋予了“天”以西方基督教色彩，从而掩盖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华儒家文化的巨大差异，极易造成对儒家文化的误解。

除基督化色彩浓重外，波波夫的《论语》译本还充满浓厚的学究气，这与沙俄时代“乾嘉学派”式的学术氛围有密切关系，主要表现为采用逐字逐句的直译策略，严格按照原文的句式结构和行文方式翻译。有译文有注释，除了自己的解说外，间或引用中国古代注家如程子、朱子等人的解释。众多的儒家术语用汉字形式，与俄语注释混杂。行文有些呆板、生涩，过多的解释使译文显得冗长、阻滞。

3 中期俄译：以克里夫佐夫译本及谢缅年科译本为例

苏联时期的《论语》俄译处于敏感的政治环境中，中苏关系巨变深刻影响着苏联的汉学界。《论语》俄译尽管一直在进行，但学术须为政治服务，译者大都以凸显文本意义为特征，倾向于直译，鲜见在译文中穿插自己的评论和注解。

3.1 社会历史语境

1917年十月革命后，沙俄进入苏联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退居次要地位，中国革命成为

最具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苏联的学术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开始用政治衡量学术。出于种种原因，苏联时期，仍有大批学者冒着生命危险，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汉学蓬勃发展，苏联儒学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上世纪50年代起，《论语》的俄译一直在进行，出现了多个《论语》译本。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论语》译本以凸显文本意义为特征，注重保留原作形式，倾向于直译，鲜有对《论语》的注解和评论。这或许与当时时代及敏感的政治环境有关。苏联时期，学术必须为政治服务，何况像研究孔子这种本身就热衷于政治的思想家。

3.2 译者视域及译本特点

克里夫佐夫，1949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3年以《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获得副博士学位，1970年又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起两度到中国大使馆工作，60年代末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为中俄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克里夫佐夫在中国工作了很长时间，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他涉猎极广，在有关中国的美学思想、政治思想和社会心理及中国传统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72年，由克里夫佐夫翻译的苏联第一个《论语》译本出版。

作为翻译家，克里夫佐夫具有丰富的汉语语言和文化知识，深厚的汉学功底使他能够不受以前译者的影响，真正进入作品的世界，和原作的视域融合。基于对孔子的认知，他将“孔夫子”译为 учитель，“颇有创意，比较贴近历史”（陈开科 2002）。在此之前，俄译者大多采用音译的“孔子”（Кун-цзы），或将“孔子”视为“哲学家”而译为 философ，而之后，所有俄译者均将孔子视为“老师”而译成 учитель。此外，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克里夫佐夫倾向于直译或逐字译《论语》，注重《论语》原文对仗、排比、比喻等辞格的运用，尽量保留原作形式，译本简单，结构单一。

克里夫佐夫译本最大的特点是残缺不全。据统计，克里夫佐夫仅仅翻译了《论语》的50%左右。其中有整章的省略，也有若干语句的省略，甚至连《论语》中最重要的几句话，如对“仁”下定义的语句都省略不译。可以说，译本的残缺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有极大关系，与译者的学术态度和学术素养无关。克里夫佐夫翻译《论语》的上世纪70年代，正是中苏关系的僵化期，苏联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视为对抗手段，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浩劫，儒学遭遇批判，译者参考资料有限。因此，克里夫佐夫的译本很少有附注或解释。

继克里夫佐夫之后，《论语》的俄译进入回暖期。这个时期在《论语》翻译方面成绩最大的恐怕就是谢缅年科了。他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1965年考入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学校主要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和古汉语。1987年，谢缅年科出版了苏联首部研究《论语》的专著《孔子学说》（«Афоризмы Конфуция»）。该书集中体现了谢缅年科对儒家思想的研究成果。书后附录是作者所译《论语》的部分译文，约占原书的一半，是作者在书中提到或引用过的《论语》语句。1994年，出版专著《孔子·论语》（«Конфуций. Изречения»），对以前的译文作了修改，补译了剩余章节。1995年，出版专著《孔子·我相信古代》（«Конфуций. Я верю в древность»），书中收录了1994年的译文，但注释较为详尽。1998年，布柳门克朗茨（М.А. Блюменкранц）编著《孔子：智者的教诲》（«Конфуций. Уроки мудрости»），之后多次再版。

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苏联汉学家在翻译《论语》时，无需考虑政治因素，而是将重心转向对《论语》文本自身意义的解读，翻译的目的也是尽最大可能传递《论语》的思想内涵。因此，谢缅年科的《论语》译文采用意译，译句简短，简洁含蓄，传达原作思想的时候还赋予其相应的艺术表现形式，可读性较强，鲜有对《论语》的注解和评论。正如他本人所言：“为了让大家能够尽可能地去发现去感受对话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节奏美，我尽量不

在文中添加任何注释，附上后人的评论。”（陈开科 2002）可见，谢缅年科旨在向苏联读者贡献一个原汁原味的《论语》。

4 近期俄译：以佩列洛莫夫译本为例

上世纪末至今，俄罗斯社会的巨大变化及世界的多极化发展构成了新时期《论语》俄译的社会历史环境。随着新的哲学及翻译思想的出现，译者更注重语境对文化意义的解读，从而纠正以前的误译，新的《论语》俄译本趋向完善，从而使俄罗斯人能够真正了解中国的儒学思想。

4.1 社会历史语境

《论语》近期俄译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直至今日。这一时期社会历史语境的新变化在国际上表现为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愈加紧密，全球化成为重要特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成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1991 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时代开启，学术氛围开始变得自由。随着儒学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其价值。中俄两国之间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入，俄罗斯欧亚主义重新兴起，意识形态逐渐淡化，“俄罗斯汉学家开始重拾对儒学的研究，以期从中汲取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有益的思想，因此，《论语》的翻译、研究与传播在俄罗斯迎来了新的高潮”（刘丽芬，赵洁 2014）。国际学术界，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冲击着逻各斯中心主义，文本不再具有终极意义。哲学诠释学深刻诠释了理解的本质，主张文本解读中既要发挥理解者的主动性，又充分尊重文本的异质成文。与此同时，翻译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聚焦于翻译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聚焦于文化影响和制约翻译的方法，聚焦于语境、历史和习俗等更宏大的事件”（Munday 2001: 127）。还有，当今社会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如民族与宗教矛盾、恐怖主义、道德危机等，所有的因素构成了新时期《论语》翻译的语境。

4.2 译者视域及译本特点

佩列洛莫夫，1928 年生于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1951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因父亲为中国人且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学术活动受到限制，转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反而为其以后的学术建树打下了坚实基础。中苏关系回暖后，佩列洛莫夫开始发表系列儒学研究成果，同时开始翻译《论语》。此时，译者可供参考的资料完备，包括《论语》其他语种的译本，还有中国学者对《论语》的各种注释、阐释及研究成果，因此译者可避免对《论语》理解的片面性与主观性，从而更加全面与客观的传达《论语》的内涵。佩列洛莫夫的译本“总结了历代俄罗斯学者《论语》译本的精华，可称得上目前俄罗斯学术界最最完善、最系统的译本”（А. Юркевич 2005）。

佩列洛莫夫译本是在批评分析已有《论语》译本的基础上翻译而成的，译本完整科学，概念翻译恰当，如核心概念“和”译为 *единство через разномыслие*（通过不同的意见达成共识）。译文简洁，译法灵活，不再局限于字句的翻译，而是采取多种翻译方案，目的是再现孔子的真实面貌，客观传达《论语》的内涵。佩列洛莫夫特别重视历史文化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他认为，要翻译古典文献，必须将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纳入考察范围，离开了时代背景，就无法弄清楚作品的具体内涵。为了让读者正确理解《论语》，佩列洛莫夫尽量保持译文与原文形式与内容的基本一致，避免误译。大量的文化词都以音译形式在译作中保留下来，采用尾注解释相关的背景知识，使读者能了解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从文化传播角度，佩列洛莫夫的译文更好地诠释了原著的思想内涵和中国文化，符合世界文化多样性及共同发展的要求。

5 结论

《论语》俄译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必定会受社会历史语境的各种制约，

反映出某种时代特点。《论语》最初的俄译处于殖民侵略、宗教传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这一时期《论语》俄译本明显具有基督化倾向。苏联时期的《论语》俄译处于敏感的政治环境中，译者倾向于直译，还原《论语》真面目。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发展构成了新时期《论语》俄译的社会历史环境，此时的《论语》俄译旨在译介中国的儒家文化，使俄罗斯人能够真正了解中国的儒学思想，因此纠误完善是其主要特点。认识到社会历史语境对翻译活动的规约作用有利于更好地理解 and 解释翻译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也有利于客观地评价译本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 [1]Mund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2]Юркевич А. Рецензии. 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е «Четверокнижие» («Сы шу»)[J].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5 (6).
- [3]陈开科. 《论语》之路——记历代俄罗斯学者对《论语》的翻译与研究 [A]. 汉学研究[C]. 中华书局, 2002(6).
- [4]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出版社, 1987.
- [5]刘丽芬, 赵 洁. 俄罗斯《论语》译介历经百年发展[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12-25.

Russian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historical Context

XIN Na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has bee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in Russia. As a communication bridge for Confucianism, Russian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has a history of 285 years during which there have been at least 17 Russian translations. These Russian translations of the *Analects* are precious cases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especially for examining typical translations from different social-historical contexts to describe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find out their connections with their social background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ranslation would change when the social system changes and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the *Analects* show different features in different social-historical contexts.

Key Words: the *Analects*; social-historical context; translator; horiz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5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文化关键词俄译的语料库实证研究”(15CYY051)、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术语汉译方法体系理论研究”(1254b010)及黑龙江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团队“俄语语言学创新研究”(TD2102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信娜(1981—),女,山东淄博人,汉族,博士,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翻译学。

收稿日期: 2016-09-06

[责任编辑: 惠秀梅]